

德日爭取聯合國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席位

吳東野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壹、前 言

一九九〇年波斯灣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即有意藉提昇聯合國的角色及功能，以賦予其維護後冷戰時期國際和平秩序的任務。在此一背景因素之下，國際間改革聯合國安理會組織架構的輿論即逐漸形成，同時亦成爲美國柯林頓(Bill Clinton)新政府實現外交理念的先決條件之一。今(一九九三)年元月十一日，聯合國秘書長蓋里(Butros Butros Ghali)閃電式地波昂之行，曾要求德國政府積極承擔國際政治的責任與義務，同時並呼籲德國各黨派應毫無保留地參與聯合國維持全球區域和平的軍事行動。^①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白宮新任命的國務卿克里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更多次公開表示，聯合國應儘快將德、日兩國納入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行列。^②克里多福針對德、日這兩個未來新強權所發佈的聲明，顯然較美國前幾任國務卿來得更堅決。白宮的此一明朗態度，不僅促成德國外長金克爾(Klaus Kinkel)飛訪華府，重新開啟德、美關係的新頁，同時還促成蓋里二月間訪問東京。^③

就在白宮公開表示支持德、日兩國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之後不久，日本首相宮澤喜一(Kiichi Miyazawa)展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與汶萊等四個東協國家的訪問行程，外相渡邊美智雄(Michio Watanabe)亦於同時訪問歐洲。緊接著在二月間，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進行亞洲五國之行(印度、新加坡、印尼、日本、南韓)。德、日兩國政府首長都安排在今年元月間訪問亞洲國家，表面上似乎是時間的巧合，但其所隱含的政治意味卻相當濃厚；換言之，宮澤與柯爾的出訪，其實與適時尋求他國支持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的席位有關。事實上，隨著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的提昇，德、日兩國都希望

註① Süddeutsche Zeitung, January 12, 1993, p. 1.

註② Die Welt, February 3, 1993, p. 1. 邱震海。「德國能成爲常任理事國。」，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二月十日，第四版。

註③ "UN Resolution Asks G8 to Solicit All Members on Enlarging Council," The Japan Times, December 13, 1992, p. 4.

在國際政治上能扮演強權角色，其所呈現出的積極主動作為，除了安排政府首長出訪尋求友邦支持之外，尚包括1.兩國政府都把爭取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席位，列為今後外交工作的重點；2.兩國政府都準備透過修憲程序，為出兵海外創造法律依據，以配合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秩序的軍事行動；3.德國力爭在本世紀末之前，完成歐洲統一的目標，並維護歐洲政經發展的主導權，日本則積極提倡「亞洲主義」外交，不僅藉倡議成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CSCA)，安撫亞洲國家對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疑慮，同時還藉著推動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加強日本對亞洲國家的經援，來爭取亞洲國家支持日本在國際政治的領導地位；4.為避免其他強權的反對，德國曾表示必要時願意放棄常任理事國所擁有的否決權，④同時亦不反對擴增安理會的成員編制。反觀日本，為了紓緩開發中國家的反對壓力，同樣亦附和改變現階段否決權使用方式的聲浪。

就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現實政治而言，誠如蓋里公開所宣稱的一句話：「沒有德、日積極參與的聯合國，很難達成提昇角色與功能的歷史任務」。⑤理論上，德國統一後的領土面積、人口數量、或經濟實力，皆已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尤其是近乎三兆馬克的年國民生產總值(GNP)，已使其整體國力遠超過同屬西歐強權的英、法、義等國，國際間似無蓄意忽視這項現實的藉口。去年(一九九二)九月召開的第四十屆聯合國大會上，德國外長金克爾曾經強調，德國雖不會主動爭取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席位，但是如果安理會的組織架構一旦有所變更，波昂政府將適時表達此一意願。⑥同年年底，德國國會針對派兵海外參與聯合國軍事行動展開辯論時，朝野政黨更流露出對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濃厚興趣。相較之下，日本政府對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姿態，就顯然較德國積極許多。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說法，日本早在去年年初就已經針對此事與美國進行一連串的非正式協商。⑦宮澤首相更毫無隱瞞地向外表示，日本希望在聯合國獲得與其對全球經濟貢獻的對等地位。今年元月間，美國眾議院還特別為日本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召開一項公聽會，會中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議員基本上也都未持反對立場。

貳、安理會面臨組織結構之調整

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之初，國際間曾對其寄予厚望，但從四十多年歷史的演變看來，聯合國處於美、蘇軍事對峙的冷戰時期，似乎發揮不了預期中的作用，尤其在維護與促進世界和平方面的任務，安理會因受制於五個常任理事國所擁有的否決權，除了寥寥可數的幾次重大決議能獲得五強支持外，其餘議案多半因否決權的濫用導致半途而廢。自從一九八八年以

註④ Christian Tomuschadt, "Die Zukunft der Vereinten Nationen," *Europ.-Archiv*, Folge 2 - 1993, pp. 42-49.
註⑤ Mathias NAß, "Nicht-Grossmacht, sondern Nothelfer," in *Die Zeit*, No. 15, 1993, p. 4.
註⑥ *Süddeutsche Zeitung*, January 12, 1993, p. 1.
註⑦ 「美國支持德國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明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第二版。

來，特別是在東歐共黨政權與蘇聯帝國瓦解後的四年當中，聯合國安理會就決議了十四項維持全球和平的軍事任務。此一數據已超過以往四十餘年來的總和。^⑧以今年為例，聯合國就為維持海外和平部隊而預定二十六億美元的開支。^⑨近半年多以來，德、日兩國不斷向外試探躡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的同時，雖然姿態的高低不同，外交手腕上亦有所區別，但是基本心態卻一致認為，現階段的安理會組織結構，已無法反映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新形勢；換言之，國際間已沒有理由再長期將這兩個國家排擠在聯合國的最高決策機構之外。近一年來，有關聯合國安理會的改組問題在國際間逐漸形成輿論，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改革方案是：^⑩

1. 現有的五位常任理事國（美、俄、中共、英、法）仍保有其否決權，但這五強必須承諾儘量不使用該項權利，一如後冷戰最初的兩年當中，尚無任何常任理事國動用過否決權一般；

2. 另增五個不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其中德國、日本、及印度占去三個固定名額，剩餘的兩席則由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非洲的埃及與奈及利亞輪流擔任；

3. 安理會再增加五個非常任理事國，使總席數由原先的十五個增至二十五席，其中的十五席非常任理事仍交由聯合國大會選舉產生，任期維持兩年。

如果就後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的發展取向而言，前述方案理論上較能顧及區域的平衡，同時亦可以減弱國際間反對德、日兩國成為常任理事國的聲音，相當程度上更可以安撫第三世界國家爭取發言份量的高漲情緒，然而在邁向實踐的階段中，難免會因為若干難以掌握的變數而遭遇困難：

1. 德、日兩國被國際間視為引發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儘管今日這兩國已成爲全球經濟強權，同時許多國家亦期待它們能夠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但是德國統一後新納粹主義的復甦跡象，以及日本迄今仍抵賴二次大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都讓這兩國的鄰邦感到憂心，懷疑其是否有資格成爲國際政治大國。其次，德、日兩國是否誠心願意接受「不具有否決權」的安排，亦是一大疑問，更何況英、法兩國近年來向聯合國繳納的規費，已遠遠落在德、日兩國之後，^⑪德、日兩國極可能會針對未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如何在「盡義務」與「享權利」方面，去爭取對等待遇；

2. 假設安理會的理事國增至二十五席，那麼在實際的運作中，必然產生效率不彰的後果。就當前安理會的組織架構來看

註⑧ 聯合國的這些行動包括一九九〇年派遣五十名觀察員赴南非（代號 UNOMSA），以及派遣代表團觀察海地共和國之選舉（代號 ONUVEH）。祇不過這兩次非軍事行動並非安理會決議，而係聯合國大會所決定。

註⑨ 明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版。

註⑩ 明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二月四日，第二版。

註⑪ Der Fischer Welt Almanach, 1991, (Frankfurt/M.: Fischer), 1991, p. 793f.

，祇要五個常任理事國能不動用否決權，以法定多數通過某一特定議案的機會通常不低，然而一旦安理會的組織擴增到「十席常任理事與十五席非常任理事」，屆時就算五強不使用否決權，任何一項重大議案想要獲得法定多數通過，最起碼的估計也需要十七席的支持，如此必然會形成安理會成員國間難於達成共識；

3. 聯合國安理會如果增加成員國的數量，理論上它會牽涉到極為複雜的程序問題，特別是當前的聯合國已達一八一一個成員國，^⑫而且極可能會繼續增加，在這種第三世界國家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聯合國想更動任何一名常任理事國席位，皆可能動搖整體組織的結構。換言之，增加理事成員國數量並不一定是依照各國實力對比去重新安排順序，它涉及的將是一次根本而徹底的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於此時改組，除了要考虑是否因此引起貧富國家間更大的分歧，同時還須顧及若干第三世界大國（如印度或印尼等）積極尋求爭取非常任理事席位的心態。

叁、德、日邁向國際政治大國之現實困境

從現實政治的角度觀察，德、日兩國在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過程中，必然會呈現出相對不利及有利因素。就前者而言，兩國皆屬二次大戰的侵略者，迄今尚無法完全取信於國際社會，因此在邁向常任理事國行列時會遭逢外來的阻力。其次，聯合國大會在擴充安理會編制之前必須先修改憲章，刪除其中將德、日、義三國視為敵國的相關條款，例如涉及戰後託管的第七十七條與涉及安全保障與過渡性規範的第一〇六條。僅僅從這一方面來看，聯合國大多數的會員國就不易取得共識，最起碼當前德、日兩國鄰邦的反應普遍不佳。理論上，德國統一後的優勢明顯增強，就長期發展來看，德國必然會憑藉其實力來確保歐洲統一的主導地位，如此將很難避免與英、法等強權間的摩擦。

事實上，英、法兩國為了確保自身的國際地位，心態上並不希望德國成為常任理事國，特別是在全球外交事務中逐漸失去影響力的英國，即已公開表態不願與其他歐洲強權分享安理會的決策權。^⑬近一年來，英、德兩國的摩擦較以往有增無減，德國的高利率政策曾於一九九一年九月讓英鎊陷入一場嚴重的金融風暴；去年年底德國又不願以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反對，率先承認南斯拉夫兩加盟共和國（Croatia & Slovenia）的獨立；前不久，德國人慶祝發明 V1 及 V2 火箭五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更遭到英國人的強烈抨擊，原因是二次大戰期間的納粹，就是以這些火箭造成數以千計的英國平民死傷。^⑭此外，若干中小型的歐洲國家對德國的外交動向，仍心存疑慮，去年六月間丹麥公民投票結果否決了「馬斯特里赫條約」（The

註⑫ Arthur Macy Cox, "America Should Lead in Recasting the UN Role,"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ruary 24, 1993, p. 7.

註⑬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第四版。

註⑭ 邱震海，「英哀德盛摩擦難免」，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第四版。

Maastricht Treaty)，瑞士公民投票也拒絕了「歐洲經濟區」(European Economic Area)條約，這些都反映出西歐人畏懼德國強權的心態。法國雖然一向視德國為歐洲最忠實的盟邦，兩國間攜手合作的日子總比分歧時候多，但是經濟實力比不上德國，一般法國人又難於忘懷歷史情結的處境下，巴黎執政者尤其可能會堅守具有全球大國象徵性意義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甚至不惜與英國聯手對聯合國擴增常任理事國數量訂定嚴格的條件。

相較之下，日本與德國同樣背負國際形象不佳的包袱，德國統一後因為排外風潮愈演愈烈，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日本的問題卻在於迄今仍不願承認二次大戰期間對亞洲國家所犯下的罪行。這種態度使亞洲國家很難相信日本具有維持全球和平重任的誠心，更何況日本對歐、美、亞洲各國的經濟侵略(外貿順差日益擴大)，已經造成極大的反彈。處於這種情況之下，除了美國還維持堅定地支持日本擴大國際政治角色，其他常任理事國目前都不願輕易表態支持，特別是中共政權與俄羅斯，極可能以此作為獲取國家利益的籌碼。

就當前的發展情勢來看，德、日兩國在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前，聯合國大會勢必先要討論改革安理會的組織架構。如此一來，首先浮上檯面的極可能就是當前的安理會成員國是否具有廣泛之代表性問題。事實上，現階段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已無法再反映出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實力對比，俄羅斯的政治及經貿影響力已無法與前蘇聯相比，英、法兩國的經濟力量，更難與德、日兩國相匹配。此外，若干如印度、巴西、奈及利亞、或印尼等開發中國家，亦同樣積極要求成為安理會新的常任理事國。這種具有相當程度複雜性的問題，絕非美國等少數國家可獨立主導，因為祇要白宮稍不謹慎處理，就可能引發第三世界國家的抵制，進而動搖聯合國組織的基本架構。

就德、日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不利主觀因素而言，兩國境內針對修憲問題的爭議不斷。德國在野社民黨堅持派兵海外必須先修改「基本法」(Grundgesetz，即憲法)的提議，顯示修憲必須獲得聯邦參議院(Bundesrat)與聯邦眾議院(Bundesstag)兩院三分之二多數席位通過的規定，有利於主控聯邦參議院多數席位的社民黨去堅持其反對派兵海外的立場，換言之，柯爾政府即使大力推銷修憲主張，也可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最近社民黨針對柯爾決定派兵至索馬利亞之計畫，就曾向聯邦憲法法院作違憲之控訴，最後若非聯邦憲法法院作成不違憲之判決，德國派兵支援聯合國和平部隊的計畫就會落空。日本宮澤首相同樣也須面對社會黨強大壓力的窘境，宮澤被迫在國會宣示「不會祇爲了爭取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席位，而修改戰後日本的和平憲法」，^⑮同時還計畫將此議題交付日本財經、勞工、媒體、及學術界充分討論，即顯示日本在邁

註⑮ 星島日報，一九九三年二月六日，第四版；卓南生，「日朝野合奏修憲進行曲」，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八日，第三版；里田京子，「興改憲法日本爭論紛紛」，信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五月八日，第六版；T. R. Reid, "Burots Ghali Recruits Soldiers in Japan," in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9, 1993, p. A 28.

向國際政治大國之途中，來自內部的阻力很大。

其次，德國統一後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相當程度上影響到柯爾政府爭取國際政治大國地位的積極性。當前的德國輿論首重內部經濟復甦，次而注重歐市內部的政經整合，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反倒成爲第三優先考慮的施政目標。反觀日本宮澤內閣正處於政局激盪多變的一年，「佐川事件」造成能左右日本政壇動向的金丸信（Kanemaru Shin）下野，間接也導致自民黨內最大的竹下派分裂；此外，日本的經濟更是內憂外患，成長衰退與對美、歐的貿易摩擦，再配合海外派兵（PKO）法案所引起的爭議，短期內對日本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形成不利因素。

毋庸置疑，德、日兩國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過程中，亦有其有利因素。宮澤內閣近期對亞洲的外交攻勢，基本上可謂在創造未來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環境。宮澤的東南亞之行，不僅藉經援手段來爭取亞洲各國的信賴，同時亦因邀請印尼參加「亞洲集體安全會議」而使雙方縮小歧見。換言之，日本整合亞太地區的構思對其邁向國際政治大國，具有相當程度的優勢條件。基本上，德國與日本同具有利的條件之一，係積極拓展其對亞洲的經貿關係，特別是對聯合國的捐助金額已遠超過英、法兩國。柯爾政府力爭將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與「人口基金會」（UNPF）兩機構由紐約遷往波昂，並承諾增加對聯合國各項發展項目的捐款，正是在運用軟性攻勢，以協助其日後成功地爭取到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席位。其次，美國與聯合國秘書長鼎力支持，並對盟邦展開遊說工作，基本上也有助於對德、日兩國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特別是德、日兩國透過雙邊高峰會議所建立的溝通橋樑，更可以加強日本與歐市國家，以及德國和亞洲國家的政治對話。當前的日本與德國都擁有對俄羅斯經援的雄厚實力，兩國一心想建構的「三極體系」（美日德），應有助於日本與歐洲強權間直接建立互信的管道，間接亦能提昇其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

再就德、日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主觀有利因素來看，兩國內部的修憲爭議儘管激烈，但是朝野政黨基本上都能建立「想提昇國際政治主導地位，就必須盡國際責任」之共識。在聯合國秘書長蓋里訪問波昂之後，德國社民黨已同意參加聯合國「藍盔行動」（blue helm action），目前爭執的焦點僅在於憲法是否應修改，又如何修改。整體比較兩國現階段的主觀環境，德國基於戰後的「基本法」對設置軍隊及規定國民應盡服役的義務等兩方面並無嚴格之限制，因此未來在爭取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條件，顯然優於日本。日本修改戰後和平憲法的問題，則主要在於自民黨元老派議員的強烈反對。然而，目前有一種跡象顯示，主張修憲的自民黨少壯派正逐漸崛起於日本政壇，長期看來應有助於日本達成修憲的目標。

肆、未來的發展取向

整體觀察，德、日兩國積極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成敗，首要條件要看兩國政界人物能否達成修憲共識，其次則視安理會組織的改革是否具有成效。當前安理會的實際運作中，決策是否民主、決策過程是否透明、乃至於開發中國家對議事程序的影響力，不僅直接影響到未來革新後的安理會組織架構，就是對申請成為新常任理事的德、日兩國，亦有間接的影響。以聯合國近四十年的發展經驗來看，開發中國家在安理會的影響力向來有限，而五個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之中，歐美強權又占去四席，這與其所代表的區域面積和人口並不相稱。過去開發中國家經常抨擊五強以自身利益標準來決定聯合國的政策，也正因為他們常以自身的價值觀強加於他國，才導致聯合國不斷出現雙重標準的決議，造成今日的安理會已成為少數強權施展權力的工具。針對此一現象，許多聯合國成員國已積極尋求連署，期望將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席位，擴增至每一大洲都有代表成員。馬來西亞即主張把非常任理事國從現在的十席增至十八席；^⑭換言之，是在既有的成員國之外，再另增三個亞洲國家、三個非洲國家、以及兩名拉丁美洲成員；義大利更提議要根據人口、國民生產總值（GNP）、與其對聯合國財政捐助的多寡為條件，適度增加常任理事與非常任理事席數。^⑮此外，頗受批評的否決權制度，目前也因為若干聯合國成員建議取消而面臨考驗，例如日本政府正在思考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濫用否決權的問題時，就提議規定至少應有兩席以上的常任理事國連署反對，始能賦予否決權的法定效力，^⑯日本的作法顯然是想獲得開發中國家支持而採取的一項折中方案。如果我們根據現狀去評估未來可能的發展取向，那麼儘管大部份的聯合國成員國都表態支持秘書長蓋里於一九九五年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之前完成安理會改組的計畫，但是聯合國的現行體制已維持了近半個世紀之久，其中牽涉到強權的既得利益，因此不論最後改革的成效如何，改革的過程必然艱辛而複雜。理論上，聯合國大會在討論德、日問題之前，必先謀求改組安理會組織結構之共識；換句話說，德、日兩國在成為國際政治大國前，總不免經歷一段長時期的奮鬥。

德、日兩國政府固然都面臨內部反對修憲的窘境，但是德國執政的基民黨（CDU）聯合政府具有靈活的外交手腕與豐富的對外援助經驗，問題祇在於德國人對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政治意志不足，未來社民黨是否改變對修憲的態度，多半亦視此一變數而定。當前的柯爾政府似乎並不急於立即向聯合國大會提案申請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以避免因此造成國會的嚴重對立，甚至使聯合內閣瀕臨瓦解或分裂。較適當的作法是靜觀日本的動作，再決定德國的下一步驟。至於日本政府的想法，則是先在國內外製造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環境與氣氛，宮澤首相承諾加強對亞洲國家經濟援助，就是期望化解這些國家對日本修憲的疑慮，進而軟化其立場。宮澤的外交攻勢有可能促成部份亞洲國家轉向支持日本的政治領導地位，但卻未

註⑭ 同註⑨。

註⑮ 同註⑨。

註⑯ The Japan Times, May 5, 1993, p. 2.

必願意看到日本因修憲而派兵海外，原因不外乎無法釋懷二次大戰期間的日本軍國主義。去年宮澤首相爲了推動「海外派兵」法案，竟未出席巴西召開的世界環保會議，這更讓亞洲國家感受日本的心懷不軌，抨擊其口中高唱「要爲國際社會貢獻心力」，行動上卻仍念念不忘軍事大國的夢想。

日本自民黨以前幹事長小澤一郎（Ozawa Ichiro）爲主的少壯派，其大力鼓吹修憲，無異是想廢除日本憲法第九條中有關「永遠放棄以武力作爲解決國際紛爭手段」與「不得擁有軍力」等條文。事實上，以日本當前國防軍費高居全球第七，以及其配備現代化武器裝備的自衛隊，所謂的「和平憲法」第九條其實早已形同具文。今年二月一日出刊的美國新聞周刊登載一篇季辛吉的文章，他預測後冷戰時期的全球新秩序，將出現五至六個政治、經濟、軍事實力接近的強權相互競爭，而日本在柯林頓執政的四年當中，可能會從經濟大國邁向政治與軍事強權，如此必然會逼使中共強化其軍事政治路線，那麼亞洲地區的不安和緊張將可預期。^⑨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未來，亞洲地區未來的安定，相當程度上應取決於日本是否會取向軍事大國，以及是否會因日本的擴軍而引起該地區的連鎖反應。換言之，中共對日本爭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席位的立場，應該是明確而堅決地反對，目前其擺出曖昧的態度，顯然是以期待日本的回饋。

德國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最大阻力，應是來自英、法兩國的反對。英國首相梅傑（John Major）爲此還與柯林頓總統產生誤解，^⑩外相赫德（Douglas Hurd）也在下議院堅定的表示，英國絕不會放棄國際政治大國的地位，也絕不坐視德國輕易成爲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⑪法國鑒於戰後與德國堅實的盟邦關係，目前雖未明確表示支持德國，不過態度上卻顯消極，足見英、法兩國都不希望因爲德國的加入，而使其成爲象徵性的國際政治大國。站在德國的立場，想要成爲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即必須先盡國際義務。事實上，德國統一迄今已參與過聯合國六項維護國際和平的行動，祇不過柯爾政府在決定對外行動前，都會先行評估鄰邦的反應，這也是爲什麼德國一心積極推動歐洲統合的主因。後冷戰時期隨著德國地位的增強，德軍參與西方大國的集體軍事行動勢所難免，問題在於德國何時會完成修憲工作，又會朝那一個方向修改。理論上，未來德國果真能成爲安理會的重要成員，對歐洲地區的安定應有正面之功效。當然，基本條件仍視歐洲統合的進度而定；換言之，歐市政治、經濟、與貨幣聯盟在某種程度上能達到取信於歐洲盟國的地步，德國才算是完全滿足了邁向國際政治大國的條件。

^⑨ Henry Kissinger, "Clinton and The World," in *Newsweek*, February 1, 1993, pp. 45-47.

^⑩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29, 1993, p. 4.

^⑪ *Ibid.*